

# 辯証唯物論與 米邱林生物學問題

劉執之譯

世界知識叢書之十二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世界知識叢書之十二

辯證唯物論  
米邱林生物學問題

劉執之譯

上海世界知識出版社

一九五〇年四月

## 目次

|                      |                |
|----------------------|----------------|
| 辯證唯物論與米邱林生物學問題·····  | V · 斯托列托夫····· |
| 論米邱林生物學的辯證唯物論基礎····· | V · 基 汶 科····· |

# 辯證唯物論與米邱林生物學問題

V · 斯托列托夫

兩個對立營壘——民主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可以在意識形態中，特別在科學領域中找到它的深刻的反映，在科學領域中，兩個世界觀——唯物論的世界觀和唯心論的世界觀在進行不斷的尖銳的鬥爭。

在生物科學中堅持辯證法和唯物論世界觀立場的是米邱林派。企圖保持形而上學和唯心論世界觀立場的是魏斯曼和莫爾根的門徒們。

著名的去年八月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曾經以新的力量，證明了米邱林生物學的生氣勃勃。

米邱林派的力量在於它是以戰無不勝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為基礎。關於生物學問題的討論，是在共產黨領導的影響之下進行的。斯大林同志的思想指導起着決定的作用，它打開了科學工作和實際工作中的新的廣大的遠景。

在生物學上的討論，具體地指出了唯物論原則對於一切科學領域的巨大意義。辯證唯物論——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世界觀——清楚地規定了科學的目的和任務。它指出了一條解決認識自然和社會這一任務的唯一正確的態度。「……必需把生活看作正是它在實際上那樣。」——斯大

林同志在它的古典著作「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中寫道。只有用這樣的態度去研究自然，才能認識它的發展的客觀規律性，以便有效地去改變它，使它適合於人民的利益。

X

X

X

生物界的物種和物種形成問題是生物學的根本問題之一。恩格斯說，沒有種的概念，就不會有任何科學。生物科學的一切部門都必需以種的概念為基礎。達爾文曾奠定了物種和物種形成的科學基礎。列寧說：「達爾文推翻了那認為動植物的種是彼此沒有任何聯系的，偶然的，『上帝所創造的』，永不變化的東西的見解，而第一次把生物學放到完全是科學的基礎上來，確定了種的變化性和它們之間的繼承性……。」（全集第一卷一二四頁）

現代唯物論的生物學家，是以確定了種的變化性和它們之間的繼承性的達爾文的發現為根據的，但同時並不停止在這上面。他們在自己的前面提出了一個目的，即他們不僅要說明自然，而且要改造它使之跟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相適應。他們發現了把植物或動物的一個種變為另外一個種的規律性，努力學習去控制種的改造，以便有計劃地在最短期間創造植物和動物比今日所有者更優良的新種。在解決這個根本問題的探索中，唯物論的生物學家曾經利用過和正在利用着達爾文學說的所有唯物論的因素，但並不打算為它所限制。他們竭力創造性地去發展達爾文主義。在解決這個任務當中有指導意義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關於達爾文主義的批評意見。

斯大林寫道：「辯證方法說，運動有雙重的形式：進化的和革命的。」（全集第一卷三〇〇

頁)物質運動的變重形式內在於社會發展中，也內在於自然界發展中。達爾文不能辨別運動的兩種形式。他在生物界中只發現了它們的一種，即進化的形式。達爾文主義主要的缺點就在這個局限性裏。

種和種的形成問題的解決只有在辯證唯物論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偉大的俄羅斯學者米邱林的著名研究，就是往這一方向的重要的一步。

米邱林事業的繼承者萊森科和其他米邱林派生物學家，證明生物學由實驗引起了從植物的一種形式到另一種形式——例如從秋蒔植物變成春蒔植物——的變化。一個實驗者現在能够詳細察知變化之進化的道路和由一種形式變成另一種形式之飛躍的轉變。例如米邱林派已經成功地從實驗探究出從小麥的這一個種變成另一個種。今日在植物界中對於種的形成之創造性的控制已經第一次公開成為可能性。萊森科在它的「論生物科學的狀況」報告中對於這一層已經說過了。

爲了要成功地和合乎實際利益地來研究植物的一個種變爲另一個種的具體規律性，研究者應當確信這個變化的可能性本身。魏斯曼的門徒們或者不承認這種可能性，或者承認它，但將變化本身說明爲偶然的，所以是不能被認識的，不能豫言的。在這樣的觀點之下，關於物種形成的控制，想也不會想到。米邱林主義却恰恰站在與此相反的立場上：他們承認植物和動物的一種種可以變成另一種種，他們相信這種變化是有規律的和可以研究、可以認識、可以控制的。這是辯證唯物論教導我們的，這是實踐所證明的。

研究無生命的自然界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曾經制定出許許多多的常數，——無生命的物質從一種狀態轉變成另一種狀態的結節點。現代物理學和化學能夠規定在質的方面從一種元素變成另一種元素（例如從磷的原子變成硫黃的原子）的結節點來。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自然界物質的統一性的學說，給我們一個根據在生物學上也能夠規定有生命的物質從一種質的狀況變成另一種質的狀況的節結點。「萬物都是發展的，就是說萬物都是從一種狀態轉變到另一種狀態，因為發展明明並不是單純的一般的永遠的增長，加大（跟縮小相對）。」（「哲學筆記」一九四七二三九頁）

米邱林生物學所集積的全部事實，無可非難地證明一種物種變成另一種物種的可能性。但是在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由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變化，當然並不像在無生命的自然界中所表現的那樣比較單純。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相互關聯和相互移行比之無生命的自然界來有着不可比較的複雜。關於這一點，它跟存在於社會中的最複雜的關係相近。但在有生命的自然界的相互聯系的一切複雜性之下，生物學能夠以最大的正確性來規定有機體發展的過程並控制它們。我們記得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天才著作「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中把為實際應用而利用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歷史科學的正確性和適當性跟生物學來比較。

每一步都能夠發現無數的證據，來證明自然界是「……有內在聯繫的統一整體，其中各個對象或各個現象是有機地相互聯繫着，相互依存着，相互制約着的。」（「列寧主義問題」五三六

頁)。但是如果自然界是相互關聯的、統一的整體，那麼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種現象，如果它保持孤立，就不能够正確了解它。

忘記了自然界是相互聯系的、統一的整體，在科學中以及在實踐活動中就永遠要犯大錯誤。從許多可能的例子中舉出一個例子來看。有這樣的觀念傳播着：雨雪降水量少，因此植物就要苦於乾旱。雨雪降水量多，因此植物在生長時就苦於太過潮濕。而結論將是：人類無力作任何計劃，無力防止栽培植物的天災（如果把氣象條件的調節的遠景放置一旁）。而事實本身是這樣的嗎？唯物論的科學回答道：不是這樣的。前世紀末葉俄羅斯傑出的農業學家 A. A. 伊士馬伊爾斯基曾經證明，土壤的濕潤決定於土壤的種類和土壤的上部構造，差不多不再決定於雨雪的降落量了。

多庫恰也夫——科斯特契夫——維里亞木斯的學說曾指出栽培植物所必需的水份之需要的特性決定於許多條件：決定於土壤的自然構造，決定於肥土及其中有機物的繁殖之多寡，決定於耕作制度，耕作的工具，耕作期和播種期，因地勢的起伏之耕地的位置，分水界護水林之有無，耕地上防林帶之有無，——決定於峽谷的斜面有沒有種植樹林，它們裏面有沒有開掘池塘等等諸如此類的條件。人類有力量來控制這些條件。

生活的條件——這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最複雜的鏈鎖，如果把它們從整體割裂，就不可能認識它們，控制它們。因此特別不能忘記爭取斯大林的改造自然計劃的實現，這個計劃使得我們的農業提高到永遠擺脫自然的災害的程度。

作用於有生命的自然中的一切聯結，米邱林生物學是從他們的運動、變化和發展的觀點，是從他們的發生和死亡的觀點來考察的。它把運動看作「從舊質態到新質態的轉變，從單純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五三七頁）。這種革命轉變的結節點的研究，也是現代米邱林生物學的主要任務之一。

x

x

x

在有生命的自然界之發展、及其相互關係和相互轉變法則的認識中，在實踐上對它的控制之中，關於發展的決定原因其性質是怎樣的，這一知識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關於適用於社會發展上之決定原因的性質，斯大林同志寫道：「……那種在數萬年間幾乎仍舊不變的現象，決不能成爲那在幾百年間就發生根本變更的現象發展的主要原因。」（「列寧主義問題」五四九頁）

對於唯物論的生物學家說來，這個指示在有生命的自然界的發展之決定原因的研究中，是一棵指針。

對於形而上學的自然科學家說來，他們最大的特徵是頑強地企圖在自然界中找出某種永遠不變的東西，作爲變化發展的主要原因。

在物理學中曾經長時間奉行原子不變的原理。由原子所構成的物體是能够變化、改造，但原子本身却是永不變化的。這裏沒有發生、破壞。現代的物理學和化學推翻了這種觀念。

在生物科學中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停止企圖尋找不變的、不發展的，但又能命定發展的整個性質、統制發展的某種東西。從這樣的企圖中，可以說包含有魏斯曼主義莫爾根主義的整個精髓，整個本質。照這個理論說來，有一種不變的，堅固的，永遠不滅的根基——因基（Gene）——命定了流動不居的、變化的物體的道路，而控制了這個物體。魏斯曼主義基礎上所放置的主要觀念，就在這裏。

唯物論者是把運動和發展看作自然界的整個的規律性。發展只有研究發展過程的本身才能了解。

但是怎樣來研究發展的過程呢？

斯大林同志寫道：「自然界的對象或自然界的現象，是含有內在矛盾的，因為所有這些對象或現象，都有其否定方面和肯定方面，都有其過去和將來，都有其衰敗着的東西和發展着的東西，而這些對立方面的鬥爭，舊的東西與新的東西之間的鬥爭，死亡着的東西與新生着的東西之間的鬥爭，衰敗着的東西與發展着的東西之間的鬥爭，便是發展過程的實在內容，由數變進到質變這一轉變的實在內容。」（「列寧主義問題」五三九頁）

有機體和它的生活條件是統一的。存在於這一統一體裏的內在矛盾，新的東西與舊的東西之間的鬥爭，生長着的東西與衰敗着的東西的鬥爭，就是有生命的自然界之發展的原動力。米邱林和萊森科及他們的門徒們的研究，曾證明生活條件是動植物有機體的遺傳性改變的決定原因。生

活條件的改變，使得植物有機體發展的類型發生改變。發展了的變種型又引起了遺傳性的改變。

但是動植物的生活條件又決定於什麼呢？怎樣的規律性掌管着生活條件的改變呢？顯而易見的，生活條件是動植物有機體生活活動的高度結果。在自然界中有機體的一個種，爲有機體的另一個種所滋養，因此，一個種的改變，就連帶引起了另一個種或另一些種的改變。

動物的發展關聯着植物界的改變。而這一植物界的改變，又關聯着地理條件的改變。傑出的俄羅斯學者韋爾納得斯基和維里亞木斯的研究得出的結論說從生命出現在地球上的時候起，它就以自己的發展來決定着那些使植物性質改變的地理條件的改變。

關於地理條件在生活發展的決定的影響下的改變是怎樣發生的，我們暫時還知道得並不多。但我們今天已經能够用精密正確的知識來控制土壤形成的過程。土壤並不是別的，正是動植物有機體生活活動的結果。土壤並不是貯藏被植物所吸收的礦物物質的倉庫。它是一種不斷發展的，爲植物、動物、微生物的生活活動所制約的環境。

在這一場合中，如維里亞木斯所制定的，土壤形成的決定因素是植物和微生物有機體的生活活動。如果在現今的土壤上幾年不栽種植物，它就要很快失去它的肥沃性質。

不但土壤的肥沃，就是土壤存在的本身，也是爲植物的生活活動所制約的。對於生物學說來，還要添補另一個重要結論於這個主要的結論上：植物的生活活動也可以改變氣候的條件。植物的生活條件以極大的決定的程度創造了植物的本身。更正確些說，植物的一些種創造了

別的一些種的生活條件。維里亞木斯用他的物質之生物學上的循環是土壤形成的統一過程的學說指出有機體及其生活條件的體系是一個整體，有着自己的，內在於其本身的發展之內部力量。

所以動植物形成的最初的起源，不應當在個別的動物中，在個別的植物中去尋找，而應當在動物界和植物界的整個生活條件中去尋找。有機體是生活條件在他們的歷史發展中的反映。動物和植物所有改變了的形式，重新又影響它的周圍的環境，使它發生質的改變。生活條件的質的改變，是有機體新的改變的起源。

X

X

X

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為科學的無限發展及其在為共產主義建設的實際鬥爭中的應用建立了一切條件，在蘇聯，研究者有極廣泛的可能性根據辯證唯物論一層一層地深入自然的秘密裏面。

理論與實際，科學與實踐活動的統一，是透澈認識自然及人類征服自然的指路明星。米邱林的充滿戰鬥精神的格言——「我們不能等待自然的佈施，我們要從自然取得它們——這是我們的任務」——因共產黨的關心和鼓勵，已被為了提高穩固的農業收穫量，增加牲畜繁殖率，使自然力服從於自己的千百萬社會主義農業的勞動者所具體實現了。

斯大林偉大的改造自然的計劃，以及可以確切預知一般牲畜數量的巨增，使現有畜種改良和推廣良好的新種的牲畜繁殖三年計劃，表明蘇維埃社會給科學展開了怎樣的從未所見的遠景。

米邱林生物學研究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去武裝那些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之下很好

地建設共產主義的，爲我國的利益和光榮進行創造性的工作的千千萬萬農業方面的實際工作者。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真理報」)

# 論米邱林生物學的辯證唯物論基礎

V · 基汶科

現時社會生活的特徵是世界舞台上的兩個陣營的鬥爭：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陣營和以英美帝國主義爲首的帝國主義和反動陣營。

這種鬥爭在意識形態範圍裏面特別在科學領域裏面可以找到它的反映。進步的、唯物論的、推動科學往前進的方向，在跟反動的、唯心論的、形而上學的、仇視科學、偽造科學去適合支持和鞏固正在死亡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制度的目的的方向進行鬥爭。

在生物學中這樣反動的、形而上學的、唯心論的方向是魏斯曼莫爾根主義。它跟以米邱林學說爲代表的進步的唯物論方向在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

在生物學中兩個方向的鬥爭，在我國已經由進步的米邱林學說對反動的形而上學的和唯心論的魏斯曼莫爾根主義的學說完全勝利而告終。這個勝利再一次顯示進步的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對反動的形而上學的和唯心論的世界觀的優越，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

x

x

x

生物學上的科學的唯物論原則，已經爲達爾文在他的「物種原始」裏面關於進化論、關於自然淘汰和人爲淘汰學說的論述中給我們過了。在達爾文以前有機體形態發展中關於環境作用的思

想，曾爲拉馬克在他的「動物哲學」中闡述過。斯大林同志說拉馬克和達爾文的進化方法將生物科學放到了穩固的地位上。（參看「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三〇三頁）。

達爾文科學地證明植物和動物的所有現代形態，都是有機體自然之長期的自然史發展的成果。他撕毀了關於自然之目的論的、宗教的、和形而上學的觀念。「……達爾文推翻了那認爲動植物的種是彼此沒有任何聯系的、偶然的、『上帝所創造的』，永不變化的東西的見解，而第一次把生物學放到完全是科學的基礎上來，確定了種的變化性和他們之間的繼承性。……」（列寧全集第一卷一二四頁）

當提到達爾文在創立有機界進化學說中的偉大功績時，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同時指出了達爾文學說的局限性，指出了他所忽略的錯誤。達爾文不能夠解決有機自然界發展的許多重要問題：關於進化的根源與動力問題，關於有機體個體的變化性問題，關於新獲得的屬性與特性在遺傳時的鞏固與傳遞問題，雖然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達爾文在建立了有機界的進化論之後，已經給解決這些問題以一種推動了。

達爾文認爲進化的動力是有機界在擁擠的地盤上爲生存的種內鬥爭。在指出達爾文的這種錯誤時，恩格斯寫道，這種錯誤是達爾文無批判地把英國哲學家霍布士的萬人對萬人的鬥爭和英國僧侶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這種反動的資產階級社會學理論，以及把資產階級經濟學上關於競爭的理論，抄襲到生物學裏面來，賦與它們一種同一個種的代表之間爲生存而鬥爭的理論形式，種內鬥

爭的理論形式。恩格斯寫道：

「達爾文關於生存鬥爭的全部學說，都是直率從霍布士的萬人對萬人的鬥爭的學說和資產階級的競爭論的經濟學說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抄襲來的，不過是把它從社會範圍內搬運到有機自然界而已。玩了這個戲法之後，……很容易把這些學說從自然史再搬回社會史中去；如果相信因這樣的搬弄便證明這些理論是社會生活的永世不易的自然規律，就未免太天真了。」（「自然辯證法」二五一頁）

恩格斯在給拉夫洛夫的信中曾指示道，在有機自然界中，相互作用不僅包含有和諧，而且包含有衝突，不僅包含有鬥爭，而且包含有協作。所以恩格斯認為要把歷史發展的豐富性和多種多樣性「都歸到『為生存而鬥爭』的片面的乾枯的公式中，都歸到甚至在自然界中也只是有條件地被採納的公式中，是不可能的。」（「馬恩通信選集」俄文版三〇五頁）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裏面關於生物學的札記中，對於植物界和動物界中因過剩而發生的鬥爭說道，「實際上只有在植物界發展的某一階段上及動物界發展的低級階段上才有這種鬥爭」，決不能把它歸入種內鬥爭中。恩格斯繼續說道：

「但是有一些條件必須嚴格地與此分開，就是即令沒有這種過剩現象存在，物種也會變異——舊的滅亡而代之以新的，更發展的物種：例如植物和動物遷移到一個新地方的時候，新的氣候、土壤、以及別的條件都會引起動植物的變異。……關於任何一個地方的地理條件，氣候條件和其他種種條件之漸進的變化（例如中亞細亞的乾燥化），也是這樣。動物人口或者植物人口在這裏是否互相排擠這並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地理條件與其他種種條件的變化所喚起的有機體發展過程，可以發生於這種場合也可以發

生於別一種場合。——對於性的淘汰也完全一樣，馬爾薩斯學說在這裏也完全沒有作用。」（「自然辯證法」二五〇頁）

達爾文的錯誤，還在於他只承認有機體形態之漸進的進化性質，而否認自然界中的飛躍發展，這其中就有着他的世界觀的資產階級局限性的表現。

斯大林同志在指出達爾文的這個錯誤時寫道：

「……達爾文不僅排斥居維耶的激變論，而且也排斥包含革命在內的辯證地所理解的發展，而從辯證方法的觀點來看時，進化與革命，量的變化與質的變化，乃是同一運動的兩種必要的形式。」（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三〇九頁）

所以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在指出了達爾文學說的偉大科學價值以後，還批評了它的薄弱方面。在最後一個時期，極大部份資產階級生物學家，決沒有打算來除掉達爾文主義的這些薄弱方面，和發展它的科學的唯物論原則；而是相反，資產階級的生物學家竭力在把達爾文主義庸俗化，絞殺它裏面曾經有過的有價值的重要方面。這種把達爾文主義庸俗化，抽去它的科學精神的方針，在魏斯曼——孟得爾——莫爾根之流資產階級反動的實驗遺傳學奠立者的學說中有特別明顯的表現。

「新達爾文主義」是生物學中反動的形而上學的唯心論派，是作為對達爾文學說的唯物論原則的反動而發生的。魏斯曼、孟得爾、莫爾根以及他們的擁護者和後繼者，在達爾文死後隱蔽在「新達爾文主義」旗幟之下，進行反對拉馬克的實有的和被他們虛構的錯誤，帶着形而上學和唯